

公民权利与微观权力内涵关系的政治哲学诠释

张 高^{*}

〔摘 要〕 权力,既有表现为国家机器和政治暴力形式的宏观权力,也有普遍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风俗习惯、人伦道德、言行举止、众目睽睽以及各种集会和网络传媒中的微观权力。只是现实中少有人觉识:公民权利不仅自在地拥有可转化为宏观权力的微观权力,微观权力也可反过来维护公民权利。特别是要想杜绝权力异化,保证各类人权,就需要唤醒每个人的权利意识和权力意志,使人对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渐从过去宏观权力的强制演化为微观权力的规训;使公民能够通过普遍的权力话语将各类实践转变为与公民权利紧密结合的民事行为,以真正实现权利和权力、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微观权力和宏观权力的统一。

〔关键词〕 公民权利;微观权力;宏观权力;公权

尽管现在许多公民都已经觉识自己拥有自然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等诸多权利(rights),却很少有人确识权利就是权力,更不知每一种公民权利都内在地镶嵌着微观权力(micro power)。只是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于从宏观上把权力看作国家机器、暴力工具以及强者“剥削、压迫、统治、操纵、惩罚、奴役或镇压”弱者的行为或方式,或是看作君权神授的一种神圣力量,没有去深入分析和发掘贯穿于人类社会一切领域和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肉体和精神、感官和思维以及日常交往、交际、交流等诸多行动中的微观权力。实际上,诸如此类的微观权力不仅可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由微小之量变引起飞跃性的质变,由此达及“积跬步以至千里”的宏观效果,而且可以鲜明地标示公民权利内涵的微观权力与宏观政权之间所具有的一种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如果公民们能够认知或懂得这种关系,就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各种微观权力来制约宏观权力或遏制公权滥用,维护自身权益。确认每个人的“天赋人权”都内在地包含权利和权力,证明“人类的权利是神圣的,……一切政治都必须跪拜在权利面前。”^①为此,每个人都命定地是社会和自身命运的主人。至于这个世界从古至今都存在“奴婢和奴隶”,那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没有苏醒,权力意志没有显现,主体精神没有成熟,以至他们本该受尊重的权利被遮掩,本该行使的权力被剥夺。直到面临生死抉择,方才想到变法和革命,尽显权力本色。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以及认识公民权利和微观权力之间的本质关联,将会极大

^{*}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210097。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研究成果。

① [英]古纳尔·贝克:《费希特和康德论自由、权利和法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16页。

提升公民的权利观念和权力意志。

一、公民权利自在地包含微观权力

虽然权力长期都表现为一种国家机器和强权政治,即如马克思所言:“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①但它的确还有另一种微观形式,即权力不只存在于战场、刑场、绞刑架、朝服、笏板或各类指令中,也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实践中的那些极其微小的、甚至是若有若无的行为要素或公众权力、文化传统以及各种体现“人多势众”的游行集会和以多胜少的民主形式中。因此权力并不只是一种粗暴霸道的权杖,也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综合力量。在人类社会,不论是知识、话语、规训或教育,都与各类权力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即便是一个头戴皇冠的国王面对拥有各类权利的臣民也常常会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为什么公民权利中会内在地包含微观权力呢?

这是由权利本性决定的。所谓权利,就是指人们生来俱有的自由、欲求和生存意志,就是指将人们拥有的这类“人格性的原初权利变成共同追求集体目标的权利和接受自身地位与承担自身义务的权利。”^②为此,它不仅代表着个人的权益,而且被认为是人类获得自由的一种原动力,“具有识别善与恶的功能”。当然,本质上是人类意识对自身和外部世界以及人际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与实践。正像希尔·格林所言:“如果在社会成员方面没有对共同利益的意识,就不可能有权利。”^③若没有对共同利益的追求、索取和占有,也不可能有实在的权利。只是这种占有既属于个人,也需要个人所在群体的默许或认可,否则将既不合理、合法,也不会变为现实。因为任何人对某物的占有都必然要“涉及早已预想到的跟别人的关系。”^④没有跟别人的关系,也就不会有自己的存在、进步和发展。这就决定一切权利都必须同时属于某个群体、团体或整个社会。如此一来,从权利中也就自然产生出表现为“生存斗争或争权夺利”的权力关系及权力形式。

这种权力尽管在每个人身上显得微不足道,但当面对社会出现的“人言可畏、众口铄金”以及单纯依靠“摇唇鼓舌,便可拜将封侯”的大量现象时,就会确信这种微观权力既可以积微见著形成宏观权力,而且最终将表现为大众民主或公民权利。同时说明,一个人即使他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然而要想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忽视社会基础、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周围环境、大众心理以及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和符号系统。正基于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厄尼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在论述当代或后现代权力的性质、特征及其演变形式时,指出:眼下,在人们使用符号权力来替代民主政治的现代形式之后,“便会借助于强调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价值,通过自由话语形成一种符号框架或象征性形式”^⑤,使得未来的权力和权利都将表现为用文字符号表达的微观形式。特别是当现实中那种依靠专政机器或国家政治不能够公正、理想地解决公民权益的时候,人们便会发现借助一些符号化法权更有利于稳妥地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原因就是作为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个人不仅“承担着自然权利,而且是各种混合机制的统一体或理性的主体。在所有情况下,这些主体都是从社会和权力关系、语言、文化和全部将可能性付诸现实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⑥正是这种实践和抽象使得每位公民的“天赋人权”中都蕴含着“克敌制胜”的微观权力。

① [德]马克思等:《论历史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

② [英]古纳尔·贝克:《费希特和康德论自由、权利和法律》,第189页。

③ [美]贝思·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王守昌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④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9页。

⑤ E.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 167.

⑥ E.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p. 168.

也正是这种具有社会性、公众性、观念性、话语性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微观权力,使得广大公民都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投入或作用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场域。他们既可以通过宏观的民主选举、参政议政、审查监督,直至通过政治斗争、舆论宣传等途径来行使自己的公民权,也可以借助或利用一切现存的语言文字、大众媒体、网络信息、宗教信仰、精神意识、理论观念来践行自己的微观权力。此情此景,恰如美国学者林·亨特(Lynn Hunt)所言,现实中,一切公开地、明确地、正式或非正式地陈述、解释、阐明或告知行为以及一切体现在文字或公共法案中的声明、主张、信条或法令,不仅标志着权利主体在总体态度和心理期待上的权利欲求,也确实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微观权力实现主权的转换。

事实上,只要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民愤、民怨、民变、革新、改良、聚众造反或群体革命”等社会现象,或是看看眼下大众监督、网络舆论对腐败分子的震慑作用,抑或是在民主政治中,经常出现的贱民政治(微观权力)对精英政治(宏观权力)的大获全胜,就会深切感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从政之道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等珠玑箴言是何等正确。当然,公民权利并不都是以“聚小溪而成江河”的形式起作用,而是其隐含的微观权力常常会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起作用。此时,权利和权力表面上看像是悄无声息、毫无关联,其实,它“不仅涉及新的人学理论,也涉及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涉及自由的一种生死攸关的需要的产生和发展”^①。

当然,现实中人们最熟知的还主要是普遍存在于党派活动、政治纲领、建国方略等无数领域中的宏观权力,然而任何国家大业都要通过个人的权利意志和拥有的微观权力而得以实现,并由此体现权利和权力的内在关系以及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的统一。所以,虽然一个普通公民能够拥有的只是个人权利或绵薄之力,但正是这种权利的普遍性,使他能够将权利蕴涵的微观权力通过民主方式让渡给能够代表自身权益的人。结果,人们既可以通过权力代表者而得到回报,又可以使其得到约束,或因各种轻率行为受到惩罚。正因如此,眼下的微观权力使得人类社会诸多领域的处理方式都发生革命性转变。“如同今天在国际背景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捍卫人权和公民自由已经变成最紧迫的民众要求。”^②

特别是在监视领域,过去那些把特定对象处于权力机构注视之下的行为,基于对微观权力的觉识和应用,开始被当作一条普遍的监视原则应用于整个社会,并由此兴起各种与监视、监管、跟踪、侦察、查探等有关的职业。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开始把监视或注视行为转向自身。而人们一旦成为自身的注视对象,这种“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规训就会推动与之相关的爱好和兴趣;就会促动人们自觉地抑制社会上的各种不良行为,自觉维护美好的事物,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保护地球,珍爱环境。由此,形成一种理性的注视行为和道德倾向。此时,不仅“每一个同志都会变成监视者”,而且“每一个监视者也都会变成同志”^③。这也是今天人们把监督权或注视权看作自身应该享有的一种神圣权利的原因所在。

在这种权利作用下,普遍性惩罚就需要一种正当性、合理性与强制性相统一的道德责任、道德成本以及自觉地尊重公民权利、顺从微观权力的道德标准。这种微观权力在通过监控消除危险状态,通过反复训诫改变人的行为的同时,也使得一些邪恶分子在微观权力的强压之下,变得小心谨慎。他们害怕广大公民的眼睛、耳朵、大脑和心境,害怕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微观权力就像一条法力无边的织网在悄然无声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举止。除非一些顽固分子才会继续冲破各种权力之网,作奸犯科,否则在“他人就是地狱”的微观权力包围中,拥有自然平衡能力的社会权利将会“公平地惩罚非法

①H. Marcuse, *Five Lectures*,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70, p. 65.

②E.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p. 170.

③[法]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践踏他人最重要利益的人。”^①

二、对权利和权力的觉识与奋争

权利和权力固然为每个人天生拥有,却需要人们的觉识、领悟、认知、实践和奋争,方能将其潜在性或先在性变为可能性和现实性。因为在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人类社会,自私性、自主性、能动性、主观性、个体化意向和权力化趋向,决定人们绝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经过奋斗获得的权利和权力。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放弃奋争和权力就是“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②。这种放弃既不合乎积极向上的普遍人性,也不合乎拥有自己的爱好和希冀、试图活得永久、过得精彩的个人的追求和特征。所以,奋争、冒险和战斗,往往是人们最经常拥有的行为品性。也正是基于这些行为品性,才使得许多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奋争获得其应该拥有的权利和权力,而且以此为契机在人类的奋斗史上建立了一个个合乎自由意志和权力意志的民主形式。

当然在任何开放、开明的民主政府和国度里,都会出现公民的反抗行动,但这既不令人惊异,也不可怕或令人担忧。“公民之所以会有反抗行动,一是其所在国家没有一个关于政治权威的合理权项;二是公民反抗涉及的道德考虑击败或重于遵守法律的义务。在这两种情况下,公民的反抗行动都是正确的。”^③更何况由矛盾冲突引发的反抗乃至革命,常常既是权力意志的展示和体现,又是固有权利的自由本性的使然和张扬。如果这种自由被剥夺,那么被剥夺者就有权利利用强力夺回。而且只有通过如此之自由意志建立的国家制度和民主政权,才可能激励和推动人人尽心尽职、意气风发,使国家兴盛强大,使社会达致河清海晏,所到之处既无浮华也无骄奢,民风淳朴,童叟无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生活幸福美满。由此,人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由的全面发展和人性的完美复归。

这种自由和权利不只是人性的标志,而且任何人要想获得标识自身本质的这两种存在,就只能依靠自身力量。为此,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政权时,指出要想建立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取缔一切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④。遗憾的是,尽管在他看来,只要广大公民通过群体实践或社会革命能够将微观权力变成宏观权力,就能够从他人的奴役中获得解放,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使自身的正当权益得到保障,然而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权力似乎普遍地情有独钟,不论是谁,一旦大权在握,“取而代之的就是征服人类个体,威胁人的存在,限制人的自由”^⑤,并将自身权利无限放大为无约无束的特权。而要想杜绝这种权力异化和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保证人的自由平等,让每个人都能够遵循内在的自然法则无私公平地行动,就需要将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归于“生命权和生存权”的支配。让政治合乎正义,让民主合乎人心,让经济合乎公平,让行动遵从权利,让权力尊重人性。此时此刻,任何立法或行政机构若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利或被命名为权利的权益,“就要迫使他们公开地交代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合法性与重要性、所采取的手段的适当性,以及权利规则禁止某些作为与不作为的理由。”^⑥

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持之以恒地连续推进宏观权力进入微观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将关注点转

① [美] 史蒂芬·霍尔姆斯等:《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② [法]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页。

③ D. Lefkowitz, *On a Moral Right to Civil Disobed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202—203.

④ [德]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43页。

⑤ A.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0, p. 107.

⑥ [美] 史蒂芬·霍尔姆斯等:《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第73页。

移到“生产和工作场所”、及至人人皆主体的日常生活领域。如此,不仅会导致个人行为选择的个性化,也会拒绝把政治只是一味地理解为单纯的阶级统治和政治革命。因为现实中的许多行为和现象,如霸权主义、官僚制度以及贪腐行为等都不能只用阶级概念或阶级政治来解释。人是一种欲望动物:有人,就有欲望、追求、矛盾和斗争。

但这并不排除人类可以依赖某种新方式共同生存。因为每个人“总是多样的和矛盾的主体,总是属于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的居民,总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所建构,总是偶然地、临时地在那些主体地位的交合处被缝合而成”^①。因此发展多元政治、多元民主、多元的治国方略,能够避免危害和牺牲民主政治的隐患。民主是人性的要求,也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平合理的权益的最好的途径和手段。为此,自古以来,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坚持和主张:人类“要以一种保证最大可能的‘自决’的方式来‘扩大民主革命’”^②。特别是面对各种矛盾冲突蜂拥而至的现当代,更要为走向更加自由、民主和多元的社会创造条件和潜力。它将把认知的基础从复杂的经济政治结构转向各种话语层面;它将更多地考虑主观认同、自由意志、天赋权利以及最合乎人性的要求和道义。当然,也只有“运用暴力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③。也只有如此行径,才能够真正展现人类的智慧和本能,让个体生命和整个人世间都充满光辉和华彩。

然而人们在追求、建构和践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也必须注意: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和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内在地包含着矛盾和缺憾,一如尼采所言:即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只要它都暴露出来,也就会“变得非常贫瘠”。当然,民主政治也不例外。因此,真正的人道主义政治,就是能够确实保障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有和实践个人的权利和权力,成为一个创造历史和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独立主体。既然如此,人们在奋争自己的权益的时候,都不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都必须对自身固有的权利和权力有所约束和限制。否则,社会全息律和经常出现的“蝴蝶效应”将会残酷地提出警示:出现于社会上的哪怕一个不起眼的动作或行径都有可能引起一连串的巨大反应。因为人类社会相对于自然界,在初始因的作用上常常又增加了一种十分重要的“集体社会心理”或“微观权利和微观权力”的作用。更何况,任何人作为一种整体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即使你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约束,也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原因能够制约你的所作所为。”^④因此,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能只是义正词严地反对“自由意志是被决定”的说法。世界上无一物不是处于对立统一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矛盾关系中,更何况自由意志,归根结底也是理性人所特有的一种欲求和能力。

三、发挥微观权力遏制公权滥用

由于权力,特别是宏观权力不可避免地伴随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恶行而带有恶的性质,因此任何时候人们都需要抑恶扬善,防止和遏制公权滥用。这样,也就既需要加强对公民权利所拥有的微观权力的组织和建设,也需要为官者加强对自身拥有的宏观权力的约束和限制。

就微观权力而言,要睁开、睁大和有效地利用福柯所谓的“权力的眼睛”。由于这种权力主要存在于公民的权利和日常行为中,故其最重要的做法就是要强化广大公民的微观权力意识,积极利用微观权力的价值,发挥微观权力的作用。要确信这样一种理念:权力从来都不会专属个人。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所拥有的权力也都极其有限,这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墨索里

①A.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p. 23.

②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③[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④A.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3, p. 68.

尼和东条英机等战争恶魔都惨死于人民权力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原因所在,也是权力的行使从过去的强暴形式演变为思想控制和柔润威慑的原因和根据。只是这种控制和威慑的内在冲动力也同样会不断地制造矛盾和对抗。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权力手段或权力形式,都需要坚持与人类权利紧密相关的知识真理、公平和正义,从而使得无论是通常的社会实践、行政管理、业务操作,还是与之相关的规训、惩罚、全景式监狱,都需要智慧地使用和发挥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并要把它看作是“人类心灵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伦布之蛋。”^①并在使用中明白:“如果承认人的世界和人自身是自我创造的产物,那么一个人就必须依靠自己解放自己。”^②

这样,既会使得公民权利和微观权力得到普遍彰显,也会使得公民的权力意志获得全面发展。为此,也会使得“革命的思想家们也躬身于科学的判决。……保留着科学作为真理的标准”^③。因为只有拥有知识真理的科学技术,才能够使人们在“战天斗地”的社会实践中拥有更多的权利、权力和自由。而且一旦广大公民掌握科学技术,其权利中蕴含的微观权力就会形成一种摧枯拉朽的合力,使得“今天人类生活的具体世界的任何形式,以及技术和自然环境的任何转变都成为可能”^④。这“不仅会大大地扩展我们的科学能力,而且会从根本上转换我们的政治境况”^⑤,使现有的宏观权力日益变成人人都可以参与和受益的行政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写人类的权力史,即“从地缘政治的大战略到住所的小策略、从教室这样制度化的建筑到医院的设计”,处处都充满或渗透着微观权力的作用和威力。

在这里,参与诸如此类的权力场域建构的“行动者或行动者系统,可以被描述为众多的力量。这些力量通过其存在、对抗或组合,决定其在特定时代、特定时刻的特定结构。反过来,每个行动者都通过其在场域中的特定位置得到界定”^⑥。进而将微观权力转化为符号权力和宏观权力,以便更快、更好、更有效地推动人类文明和权力历史。

为此,现代人面临的关键不是要宏观权力的开放和开明,而是要推翻其对公民权利的绝对统治,解除现政权对人类权利行为的各种禁戒。坚信在密切注目社会权利的现阶段,“自由民主的内涵已经稳步地从公民权利进达公民人格,而且这种进步已经拥有一种永久性的预期。通过社会权利,我们就可以有权去奉献或分摊社会效益,获得诸如职业培训或进入劳动力市场等社会投资。公民权益的这种进展,……将推动我们去探索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之间的联系。”^⑦并确识广大公民只有强化权利意识、权力意志,关注微观权力,关心“实际情况”,扩展权利空间,不断地调整和改进权力的运行机制,才能使自身真正获得解放。

在遏制公权滥用方面,只有普遍实施广大公民的监督权和监视权,充分发挥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将宏观权力寓于微观权力之中,公权滥用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具体做法:一要确立公权观念和民主意识,使被授权官员必须将权力用于维护公民福祉和社会秩序,并且要自觉地将其置于公众权利和微观权力的监督之下,恪守民主程序,尊重民主形式,践行民主本性,依法治国,用心养民;不得肆无忌惮地滥用公权,以权谋私,及至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只有如此,才能够防止个人专权,保障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权益。二要全心全意甘当人民公仆;确立群众观念,培养集体意识;建立个体与群体、自我与社会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使广大官员既能够做到兼济百姓、天下为公,又能够遏制物欲、权

① [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第149页。

② A.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p. 172.

③ P.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1979, p. 302.

④ H. Marcuse, *Five Lectures*, p. 60.

⑤ [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⑥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⑦ M. Fix & L. Lagararon, *Social Rights and Citizenship: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Urban Institute, 2002, p. 21.

欲的无限泛滥,杜绝巧取豪夺和寡廉鲜耻;确识一切权力代表的都应是公众的权利和意愿。三要贯彻权力即管理的理念,把权力看作一种决策和管理的智慧与手段。实施权力的目的就是按照规律和秩序来领导和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并以公平的原则来分配劳动成果。特别是现代社会,“总的来看,存在着一种将权力意志与求真意志联结起来作为在社会中面对话语时之核心问题的历史趋势。”^①伴随这种趋势,权力机构要做的就是“把‘官员变成经理’”,并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使被管理对象能够获得向上勃发的生机。四要能够敏锐地洞悉未来全球性权力演变的新态势:这就是未来的权力形式、权力功能、权力性质和权力意志“既不在于欲求,更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创造与给予。”^②特别是借助语言符号发展起来的网络权力将主要是一种智能型的意向性选择。在选择中,这种权力意志将既使人类充满生机,创造出活生生的现实,也将践行身心的一体化,并展示出“自由精神性的真正规定”。^③

当然,只有发达的民主政治才能够充分激发人的权利意识,才能最大程度地展示每个人都具有的生命意志和权力意志。这不只因为施行民主程序对所有人都有利,还因为权力总是反映和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赋予所有的观点都以平等的尊重。”^④这种尊重既是“权利制衡权利的体现和需要”,也是公民的自决能力将“天赋人权”及其内在镶嵌的微观权力变成现实的前提和条件。正是在这类民主政治中,才可能确立最好的个人权利,及至最有效地利用蕴藏于社会群体中最为广泛、复杂的微观权力;真正实现权利和权力、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微观权力和宏观权力之间的和谐统一;并将其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繁荣的强大动力。

(责任编辑:杨嵘均)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Rights and Micro Power

ZHANG Xie

Abstract: Power not only has a macro form represented by the state apparatus and various forms of political violence, but also exists as a type of micro power in people's daily life, social interactions, traditions and customs, ethical relations, words and deeds, observa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social issues, various assemblies and the Internet medium. However, it is seldom recognized that civil rights contain such kind of micro power, which can be turned into macro power and protect civil rights in return. In particular, if we want to protect civil rights and prevent the alienation of absolute power,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rouse each individual's awareness of rights and his will to power. By so doing, the solution to social problems will be changed from a dependence on the exercise of macro power to a discipline enabled by the micro power. Accordingly, people can turn their various practices into civil action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ivil rights through the universal power discourse, thus achieving unity between rights and power; between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and between micro power and macro power.

Key words: civil rights; micro power; macro power; public power

① [美]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② [法] 吉尔·德勒兹:《解读尼采》,张焕民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③ [德] 黑格尔:《宗教哲学》,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

④ R. Bellamy, *Citizenship: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09—110.